

大家小书

墨子与墨家

任继愈 著



---

墨子与墨家  
任继愈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子与墨家 / 任继愈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7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2103-2

I. ①墨… II. ①任… III. ①墨翟(前480~前420)  
—人物研究②墨家—研究 IV. ①B224.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7141号

总策划: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高立志 邓雪梅

· 大家小书 ·

墨子与墨家

MOZI YU MOJIA

任继愈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85千字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12103-2

定价: 32.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 任继愈先生与墨家

李 申

墨子，名翟，是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孟子描述他当时的情形是：“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稍后于孟子的韩非，说当时的“显学”，就是儒墨两家。也就是说，墨翟及其创立的学派，在战国时代，是足以和儒家学派抗衡的大学派，甚至是唯一能和儒家学派抗衡的学派。但是秦汉统一以后，墨家学派就逐渐衰落了。汉朝初年，墨家还是当时所谓的“六家”（儒、墨、道、法、名、阴阳）之一，由于儒术独尊，其他各家之中，只有道家尚能时沉时浮地伴随着儒家，其他各家实际上都不存在了，只有他们的思想遗产，尚能以不同方式存在于以儒家为主导的思想体系之中。从唐朝后期开始，随着孟子地位的逐渐上升，墨家的思想影响也不断遭到批判和清算，墨家不仅更加衰微，甚至成了异端邪说的代名词，成为千夫所指的祸国殃民之论。直到清朝末年，在帝国主

义列强步步入侵、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墨子及其创立的学派才重新被儒者们所提起，所重视。儒者们企图从中找到可以和列强们标榜的古希腊文明相匹敌的科技文明，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延及近代，墨家学派的研究也得到了较多的重视。墨家思想，不仅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内容。上世纪八十年代，墨子的家乡，山东滕州，树起了巨大的墨子塑像，成立了墨子学会，建立了墨子研究的基地。然而近几十年来，墨家研究的声音似乎又微弱了。现在北京出版社要出版先生的《墨子与墨家》，不禁感慨系之。

墨子最重要的思想是“兼爱”，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讲爱的，却遭到讲仁爱的孟子的激烈抨击，认为兼爱说是“无父”之论，即无视自己父亲母亲应该得到较多的爱的言论，并且目之为禽兽。时下讲“爱”的声音似乎越来越高，有一个自称是“爱”的宗教，甚至主张“爱自己的仇敌”，因而似乎是应该得到所有人热爱的宗教。然而，儒墨关于爱的争论，似乎在提醒着人们，爱，这个概念中所包含的内容，有多大的不同。

墨子提倡“兼爱”的目的是“非攻”，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战争。在如今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战争仍然此伏彼起的国际形势下，墨子的主张使人倍感亲切。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该多么好啊！为了制止以大欺

小、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墨子一面派遣弟子们帮助弱国守卫，一面亲自到那些强国去说服君主。他用于说服强国君主的办法，不仅是给他们讲兼爱大家都有利，而且用自己发明的装备和战术告诉那些君主：我正在帮助被你侵略的国家，你的战争不会取胜的。

在墨子看来，强者之所以要欺凌弱者，不仅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你爱别人别人才能爱你，因而实行兼相爱；而且还因为他们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他认为，这些物质享受中，许多是不必要的。比如听音乐、厚葬，都是不必要的。因而他“非乐”，主张“节葬”。归根到底，是主张“节用”。换成今天的话，就是节制消费。后来许多人认为，墨子这些主张是好心，但这样的生活太艰苦，难以忍受，“俭而难遵”。然而墨子和他的弟子们，还有弟子的弟子们，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墨子的节用主张近乎苛刻，反对音乐又似乎可笑。然而，死者的坟墓有必要修得那么大吗？生者的婚礼有必要那么样的铺张吗？欣赏音乐有必要那么疯狂吗？那些陷入债务危机和尚未陷入危机的国家里，许多消费是不是不必要的呢？而这不必要的过度消费，和以强凌弱的战争，和资源的不恰当消耗所造成的所谓生态危机、人类堪忧的前途，是否都有着一定的联系呢？想到这里，我们还会觉得墨子的可笑吗？！



墨子主张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富裕但节俭的生活。为此，他的学派不仅认真研究政治经济理论，也亲自研究具体的科学技术。为了制止侵略战争，他们认真研究了防御战的技术和战术，并且有相应的著作《备城门》等。现在，墨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已经得到了许多研究，而《备城门》之类的著作，迄今为止，还几乎无人研究。笔者刚做研究生的时候，曾接受辅导老师谢雨春先生建议，今译过《备城门》诸篇。之所以没有进一步研究，原因主要是自己弄不懂，尽管我被认为是所谓学自然科学出身。其次也是因为自己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今天打仗谁还去修城墙！然而，那些被人们炒得热火朝天的历史事件，哪件会在今天重演呢！如果有人这样地质疑于我，我将无言以对。

墨子和他的弟子们，自己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却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别人。虽然墨子遭到许多非议，特别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者的非议，然而对于他“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精神，即把自己从头到脚都磨成粉末去帮助别人，则从未有人加以怀疑和非议。

任先生作为一个哲学、宗教和科学兼治，儒教、佛教和道教兼通的全方位地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历史上每一位思想家都是熟悉的，然而最为先生所关注，甚至倾注了满腔情感的思

思想家，第一是老子，第二就是墨子。先生对老子的关注，是大家都熟悉的。去世前不久出版的《老子绎读》，是先生对《老子》的第四次今译。先生对老子的研究，可以说是倾尽了毕生的精力。对于墨子，先生于1956年曾出版《墨子》一书。20世纪90年代，先生主持“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在这面向青少年的100多个传统文化选题中，先生自任《墨子与墨家》一书。后来需要增补，先生又请胞弟、著名经济学家任继亮先生撰写了《墨经中的自然科学》作为附录。对墨子和墨家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终生关怀。

老子和墨子的主张不同，但在先生看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替弱者说话。先生认为，老子是最早、最系统地反映农民呼声的思想家，墨子则是手工业小生产者的代表。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本身的无力和软弱，所以他们的主张常常自相矛盾，甚至依靠空想，结果也往往事与愿违，他们的学说，也就很难有大的发展。道家在整个古代的弱势和墨家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

中国历史上，农民也曾多次把自己的领袖推上皇帝宝座，其结果不过是以新的强者代替了旧的强者，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农民，仍然作为弱者存在。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不过是强者起初强大、后来腐败，被新的强者所代替的规律。而腐败

的原因，也往往是新的强者忘记了自己原是弱者，因而不<sup>再</sup>替弱者说话，也不再为弱者办事。

迄今为止的历史，主宰当时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可说都是强者。因而思想家们，也往往是愿意替强者说话的多，替弱者说话的少。然而先生特别钟情于这些替弱者说话的思想家，因为先生是把“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作为处世原则的学者。

先生对墨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作为学生，不愿妄议。借北京出版社再版先生《墨子与墨家》的机会，讲一点阅读先生遗著的读后感，以践出版社之约，也是向先生交的又一份作业。

2011年11月14日

## 目 录

- 001 / 一 墨学产生的时代条件
- 007 / 二 墨翟与《墨子》一书
- 021 / 三 止楚攻宋的故事
- 025 / 四 非攻和兼爱
- 035 / 五 非乐、非命、节用、节葬
- 048 / 六 尚贤、尚同
- 057 / 七 天志、明鬼
- 063 / 八 三表
- 071 / 九 后期墨家和《墨经》
- 091 / 十 墨学的历史地位
- 097 / 附录 《墨经》对科学的贡献

## 一 墨学产生的时代条件

春秋后期，生产有所发展，根据地下出土的器物，证明春秋时代已在广泛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有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荒地的开垦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兴修，也造成了有利条件。因此，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坚固而锐利的铁制工具的应用，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之交换关系的进步，手工业逐渐由分工而走向专业化。当时已有木工、皮革工、冶金工、陶工、缝工和织工等，总称为“百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加，货币流通也日益广泛，并出现了金属货币。这时，商业资本已较发达，各地的物产大量交流。贵族以外的大商人也出现了，如弦高、范蠡〔苾里〕、端木赐（子贡）等人都是。

在春秋时代，大小国家很多，它们各霸一方，不断地进行

兼并掠夺战争；战争的规模也更为扩大。

在战争中，大国对小国进行掠夺；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掠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在战争中，无论大国小国，最受痛苦的是小农和小生产者，他们是战争的人力和物力的主要担负者。当时小农和小生产者，即使在战争中免于死亡，也不得不忍受饥寒的痛苦。齐国的晏婴说齐国“三老冻饿”，晋国的叔向说晋国“道殣〔jìn 禁〕相望”。像齐、晋这样的大国，人民尚且不能免于大量冻死和饿死的威胁，其他小国人民的悲惨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民不但在战争中担负人力和物力，而且在平时还要承受统治者的各种残酷的剥削，因而他们日趋破产，青壮年大批逃亡，老年死于饥寒，人民开始用各种方式来反对统治者的掠夺和压迫。

在这种战争、掠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剧烈冲击下，旧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贵族制度逐渐瓦解。当时，已出现新的土地占有者，也出现了逐渐脱离贵族羁绊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小私有者。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不同阶级出身的“士”，纷纷要求参与政治，企图创立一套新的学说或办法来适应当时的情况。而各国的国君和卿大夫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便礼贤下士，招徕贤

能作为助手。因此，士的阶层就逐渐扩大起来，并且得到了广泛活动的机会。

士这一阶层的一个来源是由旧贵族没落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受过贵族教育，在社会秩序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不能世袭，也没有固定的财产，依靠出卖知识技能维持生活。士这一阶层的另外一个来源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动，从小生产者上升起来的知识分子。所以士是一个流品复杂的阶层。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是前一个来源的士，他们多半是由一些没落的贵族成为士的；墨子和他代表的墨家是后一个来源的士，他们是由当时的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上升为士的；老子、杨朱则是由旧日没落贵族下降为农民或小私有者而成为“隐士”的。老子这一派和前两派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不积极向当权的世袭贵族靠拢，而采取和当时的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墨子和老子所代表的士，都不轻视体力劳动，这一点却是和一向轻视体力劳动的儒家不同。

墨子自己曾说过，“翟〔dí 敌〕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以下引文出自《墨子》一书者，只注篇名），可见他既不是直接统治人民的人，也不是直接参加“耕农之难”的人。他的任务不在于直接参加生产，而在于宣传并实行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当时，士的任务在于“上说下教”，“坐而言义”，“遍从人而说之”。

墨子和他的绝大多数弟子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在西周时代，“工商食官”，当时设有专门负责管理奴隶工匠的工官。到春秋时，一部分工官失去职位（不只工官，如祝、巫、史和乐官也都流散到各地），一部分工奴得到解放，加入本来就有的独立的小生产者的阶层。《论语·子张》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就说明了这一情况。墨子本人原来也是一位精通制造器械的人。而且他制造器具，重在实用。他的技巧，特别是在制造防御战争中用的器械这一方面的造诣，远远超过当时举世闻名的公输般。我们从《墨子》书中《备城门》以下各篇，以及后期墨家所表现的对力学、光学、几何学和一般物理学方面丰富的知识，完全有根据说墨子和他的学派是兼通器械制造技术的。墨家学派的成员并非都是从事器械制造的。其中也有从事耕田的，也有以织草鞋、编席子为生的，像《孟子·滕文公上》篇所说的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屨〔jù 具〕织席以为食”，也是属于墨子学派。

照墨子和墨家的原则，他们反对“厉民以自养”，反对剥削和过分享受的生活，主张自食其力。因此，他们一方面要国君行其道，一方面尽量减低国君对他们的供养，《吕氏春



秋·高义》篇记载墨子的话说：

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即编民），未敢求仕。

这和战国时期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作风迥然不同。墨子学派即使到战国时期士的活动范围更为扩大时，仍然经常过着极端刻苦的团体生活：“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篇），被儒家称为“役夫之道”（《荀子·王霸》篇），司马谈说墨子之道“俭而难遵”（《史记·太史公自序》），庄子说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又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跣屣〔qí juē 奇屣〕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楚国大臣穆贺听了墨子所说的道理，很受感动，只是觉得“贱人之所为”，怕楚王不肯采用。

墨子和他的学派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正当的愿望，控诉了贵族腐化生活的不合理，替人民群众喊出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呼声，这些都构成墨子学派光辉不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墨子和他的学派毕竟还是士，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劳动